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丛书 总主编/吴义勤

郭沫若研究十六讲

贾振勇/著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丛书

guomoru
yanjiu 16 jiang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丛书 总主编/吴义勤

郭沫若研究十六讲

贾振勇/著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丛书

guomoru
jiajiuyi6jiang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沫若研究十六讲 / 贾振勇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 4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丛书 / 吴义勤总主编)

ISBN 978-7-5329-2939-9

I. 郭… II. 贾… III. 郭沫若 (1892 ~ 1978) — 文学研究 — 研究生 — 教材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998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 sdpress. com. cn](http://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 com. cn](mailto: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85 × 260 毫米 16 开
印张/25 插页/2 千字/321
定 价 35.00 元

总序

吴义勤

人文学科特别是传统的人文基础学科的研究生究竟需不需要教材？可以说，自从我国开展研究生教育以来，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当然更不会有统一的共识。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我国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基本上采取的是没有专业教材的培养方式，不仅没有全国性的像本科生那样规范性、统编性的专业课教材，甚至各个高校、各个学科专业也都没有自编的教材。这种状态既与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理念有关，也与我们对教材的认识有关。在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理念中，研究生是高级的专门性人才，是具有高度自觉的学习与研究能力的人才，因此课堂教学和课程设计多是基于这种理念和认识，我们重视的是研究生的主动性研究能力和学术自觉性的培养，知识性的传授基本上被排除在研究生教学体系之外。研究生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主动地去阅读、查找相关的研究资料、书籍，而不是从某个专门的教材里去被动地阅读、掌握某种知识。而基于此，教材通常也被认为是知识性、基础性、普及性的，与研究生层次的人才需要不相适应。此外，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限制，客观上也制约了教材编写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过去我们一个专业每年通常只招收有限的几名研究生，一个导师一年最多也只招收一两名研究生，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授课方式、培养方式就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自然不需要依赖教材。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出现了巨大变化，对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材的传统认知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表现在：其一，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现在很多专业一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已达到了50名左右。拿我们山东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来说，近些年一直保持着40名以上的招生规模。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许多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一个班级的人数。而我们每一个导师年招收研究生也至少保持在4~6名左右，三年内的在校生也

达到了十几名的规模。面对这样的规模，如果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仍然采取“放羊式”的教育恐怕就会有很多弊端。其二，研究生本身的素质和构成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生都是高层次的精英人才，他们有着明确的学术追求，有着强烈的学术热情，有着献身学术的理想的话，那么今天的研究生队伍则鱼龙混杂、结构多元。很多研究生并不是为了纯粹学术的目的而考研究生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现实处境、为了延缓自己的就业压力、为了换一个更高的文凭、为了考公务员增加筹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采取那种精英式的、贵族式的培养方式，还把教育的基点定位在研究生的主动性、自觉性上，那么研究生培养可能会遭遇巨大的失败，许多人可能读了三年研究生不但学养、素质、水平、知识上没有进步，反而大倒退。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今天的研究生教育进行转型或调整是必要而紧迫的。而转型或调整的关键就是改变观念、改变方式，适应形势的变化以及研究生主体本身的变化，增强研究生教学的规范性和强制性。

在我们看来，研究生教育规范性和强制性的基础就是专业教材的建设。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学术传统，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准备在全国率先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教材的尝试，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教材的编写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同时也对教师的教学起到某种规范作用。传统的研究生教学基本上没有固定的课程，老师基本上不上课，即使上课随意性也很大。这种方式从好的方面说，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授课的内容比较灵活、自由，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展示学术个性的空间；从不好的方面说，也因授课内容的不确定带来了授课的散漫、随意，难免造成学习基础不同的学生不得要领的情形，因为缺乏教材也使学生的自学和课后温习变得艰难起来。同时，对老师的考核和要求变得很困难，无法对老师的责任心、教学态度、教学内容进行基本的衡量。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教材的建设，为研究生教育设定“最低目标”。当研究生不再是“理想化”的研究生之后，当研究生没有了崇高的学术目标之后，我们至少要保证他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仍然有进步，有收获。他三年内应该上多少课程，每门课应该掌握多少东西、阅读多少书籍，我们希望通过教材明确下来，并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这样，哪怕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不能够培养出多少“学术

精英”，但整体的研究生质量至少不会发生大滑坡。

当然，研究生专业教材的编写还有另外的意义。课程教材建设是推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一种积极尝试，它汇集本专业教师的集体智慧，将多年的教学讲稿进行进一步的提升和沉淀，积极吸收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将学术的前沿信息与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相融合，将科研的基本方法和教师们多年的治学心得融入具体的教学内容之中，通过教材的形式反映出来。教材的编写将使学生的学习目标更明确，学术思路更明晰，为他们尽快掌握科研的基本方法，发挥创造才华进入科研一线进行科研实践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同时，研究生专业课教材的规范化建设也增强了国内不同高校同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可比性，有助于对全国研究生教育水平的统一评估，是保证研究生教育基本质量的重要基础。

我们这套教材将主要针对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博士生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的实际而进行，主要分博士生专业教材和硕士生专业教材两大块，包括“人文科学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现象研究”、“文学巨匠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20世纪中国经典作品重读”、“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文学史问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研究”、“中国当代流行文化研究”、“中国当代影视剧研究”、“中国当代电影研究”等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学术个性的专题性教材。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教材的编写，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规范化做出贡献，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探索新路子，比如为将来研究生的跨校学习、交流，为研究生的跨校选课和不同学校研究生的互认学分打下基础。

自古成功在尝试，研究生教材的编写能否成功，现在我们心中也没有底。我们希望以我们的尝试引起全国研究生教学界的重视，并得到大家的批评指导。

又，此套丛书是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和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重点学科项目，同时也是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NCET-06-0608 以及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工程项目成果，特记。

2008年国庆于山东师范大学

课程说明 郭沫若及郭沫若研究

导语：之所以开篇要说这么些感性的话，是因为有感而发。一是因为看了很多郭沫若的著述和关于郭沫若的研究资料后，感到对这个以文人身份闻达于世的历史人物，很多时候用理性的判断和评论不足以显示其传奇性，更不足以显示其精神世界的复杂和微妙，当一切都纳入理性的森林，就会遮蔽我们的体验和感受。当然这不是标榜自己这样表述就可以显示。二是有感于他人对我的郭沫若研究的评论，有不少方家看了我的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后，认为我同情郭沫若者有之，更有认为我“景仰”郭沫若者。如果说“景仰”郭沫若的天才，我倒是乐于承认。其实，如果看看我的原稿，看到不知尊姓大名的某位先生或女士大笔一挥写下的“骂郭够狠”、“批郭入木三分”之类的批语，就不会说我景仰了，这些原稿我都保存着，以备查证。当然这也只是别人认为的“骂郭够狠”之类，我则不这么认为。其实，对郭沫若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既非想捧杀，更非想棒杀，而是力图还原一个我在历史的长河和堆积的资料中所能看到的真实的郭沫若的形象及其精神世界和文史世界。当然，这只是我看到的郭沫若的形象和精神世界，以我观物、观人，人、物皆着我之色彩是在所难免的，观者和识者有权利进行批评。

—

关于郭沫若这个人，要说的话太多。

自从他以诗文鸣世，就深深地吸引了世人的眼球。

20 世纪 30 年代，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里，已名噪文坛的沈从文评论说：“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这作者致生特别兴趣，这样的读者也一定有的。”^①

^① 沈从文：《论郭沫若》，载李霖编《郭沫若评传》，上海现代书局 1932 年版。

在他死后的短短几天内，冰心就写出悼念文章，说他像一颗巨星，“拖着万丈光芒从我们头上飞逝了，陨落了”，说“他永远在广漠的宇宙中，横空飞驰”。冰心以颇富诗意的笔触，述说着郭沫若那首“迎风向海上飞驰”的《星空》，说自己在初生的朝云映照下，来写悼念文字，几次住笔沉吟，感慨小小的笔，实在写不尽他的热情潮涌，才调纵横的一生、前进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和创造的一生。^①

正如沈从文所言，他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熟人”。说是声名显赫也好，说是声名狼藉也罢，他的名誉，他的声望，暂且不论是非曲直、抑扬褒贬，郭沫若这个名字，的确是“仿佛差不多”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

人们不但领略过他那些大气磅礴、才华横溢的光彩华章，也领教过他那些粗制滥造、庸俗不堪的应景篇什。人们惊讶地注视过他那光芒四射、天马行空的超凡才华，也不屑地鄙夷他那趋炎附势、闻风而动的阿谀逢迎。

人们叹服于他那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的创造精神和浪漫激情，为他那胸中波澜、笔底风雷和文采风流所倾倒。可是，人们也感慨于他那屡变善变、亦步亦趋的实用姿态，为他那驯服、盲从和台前木偶般的“显赫”表演而不屑。

这是如此一个众说纷纭的人。

有人说，他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天才人物，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带领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的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是中国广大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有人说，他是可悲的文化弄臣，是以话语英雄形象欺世盗名的文化草莽，是拿文化艺术换取政治恩遇、霸气十足的文化老大，是瞎话连篇、邀宠献媚、“倡优畜之”的“班头”，是独立精神泯灭、文化人格丧失的文学侍从。

有人说，他是一个目无余子的桂冠诗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化巨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是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大动荡、大变革的转型时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典型，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似乎都可以在他传奇、浪漫的生涯中找到踪迹。有人说，郭沫若“缺钙”，风骨丧失，圆滑世故，有着双重人格，戴着双重面具，他在历史风口浪尖上的所作所为，不但

^① 冰心：《悼郭老》，载《悼念郭老》，三联书店1979年版。

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对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名节情操的污辱，断不配领受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清誉。

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价，让人如何择取？郭沫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至少，他不是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更非不足挂齿的草芥微尘；至少，他那浓缩世间百态几多影像的一生，绝非平淡无奇，而是波澜四起、常人莫及。

他一来到这个世界、呱呱坠地之时，仿佛就与众不同。据他自己说：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①

在那个蒙昧的时代，那样简陋的乡野，这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奇迹。混沌无知之时，就险遭灭顶之灾，这似乎是上苍在预言：此子大难不死，逢凶化吉，将来必成大器。

二十多年后，浪漫豪放的青年郭沫若，挟着同样浪漫豪放的《女神》横空出世了。他高唱着“凤凰”、高唱着“天狗”，一路高蹈而来，一出手便震撼了“五四”文坛，被誉为“空谷足音”、“文坛霹雳手”、“现代第一诗人”。这个曾经声称以打倒偶像为职志的人，很快就被人们特别是青年人，追捧为偶像。

直到今天，当人们追慕“五四”这个现代中国的青春时刻，当人们回望那盛况空前、群情激昂的文人知识分子的狂欢节，当人们感怀那个逝去时代的精神遗迹，特别是当人们在悠悠历史长河之中，寻觅最能体现狂飙突进、酣畅淋漓、大气磅礴、彻彻底底的“五四”精神时，便不能不提及《女神》，便不能不提及郭沫若。因为那时，正如闻一多所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精神。”^②

不过，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持中守成的人。他很快便告别个性至上、艺术至上的信条，抛弃艺术之宫和象牙之塔，一转身，迅速登上了马克思主义的

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② 《百家论郭沫若》，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宝筏”，“‘斩钉截铁’的高举起第四阶级文学的鲜红旗帜”^①，在理论和创作方面双管齐下，成为中国革命文学最早的一批呼吁者、呐喊者、推动者和创造者。

他更不是一个安分守己、坐享其成的人。他已经不满足于诗人、作家的闪亮桂冠，更不满足于教授、学长的耀眼头衔。文学的园地，学术的园地，已经无法容纳他那心怀天下的雄心壮志，他要到更广阔的天地、更汹涌的潮头去冲浪。“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于是，世间有了戎装焕发的郭沫若，有了战刀挥舞的郭沫若，有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郭沫若。

于是，我们看到了戎马倥偬之际，在屈子行吟处踌躇满志的郭沫若，看到了战火纷飞之时，在武昌城头慷慨激昂的郭沫若。那出生入死，那刀光剑影，为“戎马书生”郭沫若非凡的一生，平添了几多豪情、几多壮丽。仿佛，千古风流集于一身；仿佛，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雄关漫道，铁马秋风，挥鞭山河，纵情天地，此时的郭沫若，该是何等的激越、何等的豪迈！

到中流击水的郭沫若，是多么的幸运。他不但在生死之间多次化险为夷，更是在短短数月内屡获升迁。多少军人浴血奋战、梦寐以求，甚至是马革裹尸也难以企及的灿烂将星，在郭沫若，是唾手而得，他一跃由上校升为中将。而且，郭沫若更是得到了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蒋介石的青睐。彼时的蒋介石已具领袖行状，颇为在意等级秩序、政治礼仪，可是对郭沫若，不但堪称是礼贤下士、礼遇有加，而且更以高官厚禄相诱，欲收郭沫若为第一文胆。无论是炫目的虚名，还是不菲的实利，郭沫若唾手可得。

然而，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郭沫若，视富贵如浮云，视王侯如粪土。他不但拒绝了多少人艳羡不已的蒋总司令的一番美意，反而在国共分裂之际，公然反蒋；不但鄙弃荣华富贵，而且不顾身家安危，在青年纷纷变虫豸的年代，以非凡的勇气，写下了传颂一时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何等的激扬文字，这是何等的书生意气，这是何等的挥斥方遒！

但世运难逆，群雄逐鹿之态势渐弱，军阀纷争之烽火渐息，中国的社会政治大局渐定。蒋介石定鼎中原之日，曾几何时风光无限的郭沫若，却不得不仓皇出逃日本。昨天还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跃马挥刀，今天却不得不在日本宪警的

^① 李翔梧：《沫若：我要站在你的旗帜之下》，载1926年《洪水》第11、12期合刊。

监视下，蛰居异国他乡。

“去国十年余泪血”，在流亡生涯的困顿险恶中，郭沫若不但没有消沉委顿，反而自铭其志：“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遭其厄，愧其无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江户川畔、樱花树下，诗人、革命家的激情，转换成学者的沉毅和坚忍，他徜徉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漫漫典籍里，埋首于斑驳的青铜、甲骨堆中，会通古今、融贯中西，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阐释和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体系，其世界级的学术成果，可谓是石破天惊，堪让一时之洛阳纸贵。“举世浮沉浑似海，了无风处浪头高”，亡命天涯、去国怀乡的岁月，造就了名动天下的一代学者郭沫若。

“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流亡海外的郭沫若，并未沉湎于所谓的“清福”^①。当无耻日寇侵犯我中华之时，他凛然彰显血性男儿本色：毁家纾难、别妇抛雏、哭吐精诚、投笔请缨，毅然决然返回狼烟滚滚、烽火连天的祖国。由他领衔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被时人誉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他不但亲赴前线激励士气，更以中国文化界领袖的声望，鼓舞全民抗日的热情。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郭沫若，成为国共两党争相“礼遇”的“统战”对象。郭沫若也进退有据、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国共两党领袖和要人的频频示好之中。在这场针对郭沫若的人才争夺战中，国民党方面明显处于下风。且不说政见、理念的分歧，也不说过去的恩怨是非，仅仅就对社会形象、社会角色的期待而言，国民党显然蠢笨至极，因为区区一厅长，不过是一禄蠹、一政客，而郭沫若早在北伐时期，就已挂中将军衔。可是，除了加官晋爵，共产党几乎是全方位对郭沫若采取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是将郭沫若树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新文化的领袖，显然是棋高一招。当然，与他在政界的所作所为交相辉映，在抗战时期，郭沫若大气、浪漫的文学才情，又一次喷薄而出，他的文学创造精神，又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于是，在巴山蜀水的山城重庆，有了“满腔热力”的“雷电颂”，有了“别有精神”的“雷电颂”，有了义愤冲天的“雷电颂”。

① 国难当头之时，有人曾指责郭沫若在海外十年的生活，是逃避革命、享清福。

自此之后，郭沫若更加非常自觉地跃入了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历史潮流中，郭沫若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界领袖的形象，在政党和自我的双重塑造中，开始明晰地、坚定地浮出历史水面。然而，尽管以后郭沫若的声望日隆、地位愈高，但是，可供他自由选择的创作空间，却日益狭窄，可供他自由抉择的机遇，也日渐消弭。他那豪放不羁、浪漫张扬的性格与脾性，也不得不渐渐收敛，终至于无可奈何、落花流水。

二

古人云：“直使天惊真快事，能招人骂是奇才”。

最近二十多年以来，当代文人知识分子们，动不动就拿他“说事”。世人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可谓毁誉交加，充满了诸多“数不清、理还乱”的是非爱憎。

世人经常引为谈资的，常常是他在风云诡谲的政治动荡之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生命历程中那诸多白云苍狗般的情感漩涡。甚至是街头巷尾引车卖浆者，一句“流氓+才子”的羡慕与不屑，似乎也表明了对他的“熟稔”。

然而，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是凡夫俗子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人们称他为诗人、作家、学者、社会政治活动家，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朋友，甚至是情人。他曾称赞歌德是一个光芒四射的“球形”天才，其实，他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称号似乎也当之无愧。当然，他身上似乎也不缺乏歌德式的“庸俗”，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年，他曾以文学社团领袖和学术领袖的身份，纵横驰骋于思想文化界，又以社会贤达的政治身份，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坐看云起云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位居高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等等，这些炙手可热的头衔，使他身价百倍。他以一介书生和一介文人知识分子，获得了可能是20世纪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所能获得的最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誉。

他曾经有过的风华绝代、豪迈诗风，是多么令人神往？他曾经有过的纵横驰骋、登高一呼，是多么令人激动？他曾经有过的聪颖天资、卓越学识，是多么令人折服？他曾经有过的激情四射、浪漫风流，是多么令人艳羡？可是，对他的文化人格、道德人格、政治人格，世人却往往发出强有力的道德诘问。许多

对郭沫若进行同情式研究的资深学者，对此，也往往流露出无奈和不安，只能发出“高处不胜寒”的惋惜。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当然，子非鱼，亦安知鱼之苦、鱼之悲？

对于一个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多重文化心理和多重性格结构的百年风云人物郭沫若，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悲欢喜欣，真的让人感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古人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又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在红尘凡界，或永垂不朽，或默默无闻，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或冬虫夏鸣，或驴鸣狗吠，或叱咤风云，或悒郁困顿。可是无论怎样，这短短的一生，总是渺小如沧海之一粟、迅忽如宇宙之须臾。能如彗星般一闪而过者，亦属凤毛麟角。

浪漫、豪放的李白，曾恃酒狂呼：“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李白只说对了一半。什么圣哲先贤，什么英雄豪杰，什么大忠大善，什么大奸大恶，和凡夫俗子、匹夫匹妇乃至草木虫鱼一样，最终的归宿，无非是那寂灭的黑暗深渊。因为，在死亡面前，世法同一、众生平等。

所不同的是，那些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中，化成了历史的标记，化作了后世的谈资。可是，逝者长已矣，托体同山阿，滚滚红尘中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转眼已在身后。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也。

所以，自古逝者皆寂寞，唯有论者长喙营。

所以，阐说历史人物，评论世间往事，只是生者和来者的事情。

所以，对于郭沫若这个人，你无论怎样评价他，无论是堂堂皇皇的溢美之词，还是不绝于耳的滚滚骂名，对于他本人来说，早已是过眼云烟、前尘往事。他已经听不到世间的众声喧哗，也不会在意历史的轰鸣回声。

因为，他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呼唤春天的年代。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可以影响后世的历史人物。

后者和来者，还要聆听他在历史深处发出的遥遥回响。

三

与硕果累累的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仿佛显得还不是那么成熟。这并不是说郭沫若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不出色。这个不成熟状态，我以为主要有以

下几点原因造成：

第一，郭沫若的政治身份。郭沫若与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文人知识分子相比，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就是他的社会身份和角色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文人知识分子能像他那样获得那么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还没有哪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像他那样和 20 世纪中国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政治变动密切相连，尤其是和高层的政治互动。尽管他以文人知识分子的身份鸣世，但是其所作所为特别是后半生的所作所为，和中国社会的重大社会和政治事件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文人参政的典型，他卷入了本不该卷入的政治角力的漩涡中。在当前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这是一个让研究者感到棘手的问题。这当然也是指赋予郭沫若政治身份的那些因素、那些机制。如何能自由地介入研究对象、自由地评说研究对象，我以为目前还很难找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我本人对此深有体会，具体事例不好说起。鲁迅研究中曾有“回到鲁迅本身”、“人间鲁迅”的说法，而且一些学者的出色研究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使命。我也曾想以“人间郭沫若”、“常人郭沫若”甚至是“凡人郭沫若”为导向写点东西，但是最终不得不作罢，因为即使写完了也只能自己当自己的读者。我以为这是当前郭沫若研究面临的最重大的障碍，如果这个樊篱难以破除，我感觉郭沫若研究的重大突破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第二，道德眼光的遮蔽。婚恋情况，是郭沫若浪漫传奇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郭沫若本人屡屡遭人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郭沫若的政治人格，也是屡遭鄙夷的一个方面。当然，每个人面对历史人物，都有任意品评其道德文章的权利。但是对学者来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面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时，就不应该带着偏见进行研究，不能因为其品行而鄙薄其创造性成就。尽管古人说“文如其人”，可是中外古今历史上也有大量的现象说明“文”和“人”之间并不画等号。学术研究，讲究设身处地、进行同情式研究，这不意味着没有学术原则、为当事人开脱，而是说如何重建历史现场、尽可能回到历史深处，探讨分析历史人物在那样一个历史情境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得出一个规整的单调的结论倒是在其次。简单说，一个学者的最主要的学术任务，我以为在于说出历史和事实的真相，而不是自以为是地述说真理，即使是学术方面要经世致用，也不能随意遮蔽和剪裁历史和事实的真相。所以，面对郭沫若这样一

个在多个领域有着非凡成就的历史人物，应该丁是丁、卯是卯，不能以道德评价代替、干扰对他的其他领域成就的研究。这里的难点在于学者也是充满七情六欲，达到纯粹理性境界很难很难。所以，如何尽力避免个人之嗜好与偏见，达到较为纯粹之学术境界，也成为郭沫若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史料的匮乏。之所以说郭沫若研究还不成熟，还在于学者们对 1949 年至 1978 年这段历史中的郭沫若，还未进行较为充分的历史化和学术化处理。除了社会文化语境的限制尚未解除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有关郭沫若的关键历史资料尚未面世，他的大量书信、日记等文献资料还在睡大觉，不知何时见到天日。对于郭沫若研究史料的匮乏，我是深谙三昧，个中甘苦不必多说，自己在研究中的再三踌躇，至今历历在目，不是担心自己的推断和结论将来会被推翻，而是担心会误导他人，这就不妙了。说得严重一些，关于郭沫若当代时段的研究，由于大量的史实真伪难辨，我以为很大程度上还沾染着口耳相传阶段的特点。我看过一些关于郭沫若建国后状况的文章和著作，里面的大量史实、史料大多没有说明来源，作者又没有亲历那些场景，如何那么清楚？这种历史史实的辨析工作，或许是所有历史研究都会遇到的一种状态吧？正是因为自己曾经面临这样的困窘，所以我感到与其他现当代文学作家们的情况相比，郭沫若研究领域尤为严重。但愿随着社会语境的放松，郭沫若那些尚未解密的书信和日记能够帮助我们澄清很多历史史实。除了 1949 年后有关的郭沫若研究资料外，我以为还有一个时间段值得注意，这就是 1927 年至 1937 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固然，这段时间里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翻译等活动的资料比较丰富，但是一个与郭沫若命运关系极为密切的方面，也就是政治方面的信息却是少之又少。最近几年蔡震先生和武继平先生的相关研究颇令人注目，他们一度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较为神秘角落面纱的一角，同时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想象和研究空间，比如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和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等等问题。但是要得到准确认识，必须有新的史料发掘和印证。

第四，通识眼光的欠缺。这一点不必多说。迄今为止还没见过有哪一个研究者能通晓郭沫若所涉猎的各个领域。这一点似乎是苛求了。这里要强调的是，致力于郭沫若研究的学者，需要具备一种通识的眼光，也就是说，郭沫若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常识应该具备。否则，太专业化的解读往往造成只及其一而不及

其余的后果，而且也难以理解郭沫若作为一个“球形”天才所发出能量的巨大。如此，才能在研究中达到某种程度的融会贯通。

指出郭沫若研究中的这些障碍，并不意味着自己有能力全面克服，而是给自己和别人提个醒，尽量避免这些陷阱的诱惑，就像毒品可以使人上瘾一样，错误的观念和思维也可以使人难以自拔。时时警醒，或可少走弯路。

鉴于此，本课程拟采用文化研究、历史诗学、文本解读和史传手法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努力重建历史、文化、政治、文学的那些逝去的场景，考究郭沫若精神世界中那些复杂的变数，考究在政治文化、文人文化夹缝中一个典型中国文人的复杂精神样态，努力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化怎样影响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选择，一个人又怎样怎样地辗转腾挪去迎合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而这个人，又是多么典型的学术和文化标本。这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的目标是将真相——精神世界的真相、历史的真相，尽最大可能用合适的话语揭示出来。托克维尔在谈到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动机时，曾经说过：“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① 托克维尔的动机和理想，堪称学术研究的楷模。我们对郭沫若研究倘能做到此，那么郭沫若研究中的遗憾也就会变少，郭沫若研究的重大突破也就指日可待了。

^①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34页。

1/总序	
1/课程说明	郭沫若及郭沫若研究
1/第一讲	抗战期间文人郭沫若的政治抉择
19/第二讲	诗与政治的共鸣：郭沫若抗战历史剧
38/第三讲	意识形态想象与郭沫若的史学研究
53/第四讲	建国前夕郭沫若的政治和文学活动
72/第五讲	“新华颂”：诗、史作为意识形态改造的先声
91/第六讲	郭沫若与电影《武训传》批判风潮
108/第七讲	郭沫若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唯心主义和批判胡风运动
138/第八讲	郭沫若与“百花齐放”、“整风运动”、“反右运动”
165/第九讲	“我要永远保持着心中的春光”：隐秘的心灵私语与生命冲动
181/第十讲	“遍地皆诗写不赢”：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
201/第十一讲	“蔡文姬就是我！”：从政文人郭沫若的隐曲心声考释